

# 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概览

黄鸣奋

(厦门大学)

本文依据笔者1988和1993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所见书,利用国际联网计算机系统检索的美国哈佛大学藏书,介绍了以英语为交际手段的文化圈内对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情况,内容包括中国古典文论的综合研究、文体研究、断代史研究(分为先秦至六朝、唐宋金元、明清三组)。文中引用了包括西方90年代出版物在内的许多资料,其中有不少在国内鲜为人知。其论述对象限于相关英语书籍、博士论文和已结集出版的论文,不含报刊论文、未结集的会议论文。

## ·作者·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传入以英语为交际手段的文化圈(即“英语世界”)的过程,可以上溯至17世纪末《论语》英译、孔子的文学观为欧人所知晓之际。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英语世界里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从总体上来说进展迟缓,到本世纪50年代以前相关论著和译作只有张彭春《沧浪诗话》译本(1929),E. Huff《黄节〈诗学〉》(1947)等区区几部,寥若晨星。进入60年代以后,情形有所改观,D·S·Nivision《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1966)、wei—ping Liu,《清代诗论的发展》(1967)等六、七部论著相继问

世。70年代同读者见面的相关论著突破10部,其中的佼佼者有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975)等。80年代问世的相关论著和译作进而超过20部,包括黄兆杰《早期中国文学批评》(1983)等。90年代这方面的成果单笔者已知的就有Karl—heinz Pohl的专著《诗人、画家、书法家郑板桥》(1990),Hsiaoching Hsu的博士论文《作为宋代文学评论形式的诗话》(1991),S. Owen所译《中国文学思想读本》(1992),D. Palumbo Liu专著《袭用的诗学》(1993)等。考虑到图书流通周期,入馆上架时间等因素,不难知道90年代已付梓的相关论著当远不止上述4部。由此可见,英语世界里中国古典文论研究堪称方兴未艾,这对中国本土治文学批评史的学者既是挑战,又是促进。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与中国古典文论相并的英语书籍、博士论文和已结集出版的论文略加评述,资料来源是笔者1988、1993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所见书及利用国际联网计算机系统检索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书。

英语世界现有中国古典文论综合选本为S·Owen《中国文学思想读本》(1992),中国古典文论通论为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

(1975)等。刘若愚之作是第一部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论的西语专著,它试图修正M·H·Abrams在《镜与灯》(1953)里提出的理论模式并以之界定中国古代文论的类型。此书已有杜国清中译本(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田守真、饶曙光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专题英语论文集有A. Rickett编的《中国人对文学的探索:从孔子到梁启超》(1978),收入提交1970年12月在圣克罗伊岛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研讨会的8篇文章;S. Bush与C. Murck编的《中国艺术理论》(1983),收入1979年6月在约克城召开的旨在激发对中国美学之兴趣的一次讨论会的16篇文章。以上两部论文集收了若干专题通论,如前者所收的D·Pollard《中国文学理论中的“气”》探索了从《管子》、曹丕、刘勰、李元饶、韩愈、苏辙到桐城派对“气”的演变的看法;后者所收的M. Robertson《艺术中的分期与传统中国文学史上的模式》分析了暗含于人们用以解释和界定艺术史分期的“法规”里的价值观,追溯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对“变”的看法,Pauline Yu《中国文论里的形式区别》以现代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为参照系,考察了中国历史上“文”的观念变迁。上述两部论文集之外的专题通论,有黄兆杰的博士论文《中国文论里的“情”》(1969),Chung-yuan Chang的专著《道家和创造性:中国哲学、艺术与诗歌研究》(1963)。前者试图弄清“情”一词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里的由来和含义,由此阐释中国诗歌观的特征;后者主要探讨“道”在不同领域的表现以及艺术家如何因悟道而使其创造活动臻于完美。相关于文论的美学、哲学研究成果为数不少,如Kin-yuen Wong的博士论文《天地无言有其大美:中国“崇高”论》(1980),P. E. Moran《中国形而上学范畴探源(从肇端到朱熹)》(1983),H. Saussy的专著《一个中国美学问题》(1993)等。

就中国古典文论的分支而言,诗歌理论

在英语世界受到远过于散文理论、小说理论和戏剧理论的重视。目前已问世的诗论研究成果(含广义诗学)至少有:黄维梁的博士论文《中国印象主义批评:诗话传统研究》(1976), Ronald C. Miao编《中国诗歌与诗学研究》(1978), Tim-hung Ku的博士论文《从比较的观点透视中国的一种符号学诗论模式》(1981), M. Mi-hsi yeh的博士论文《隐喻与转喻:中西比较诗学》(1982), S. Owen的专著《世界征兆: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1985), Paulin Yu的专著《中国诗歌传统里想象的解释》(1987), 刘若愚的专著《语言——悖论——诗学:中国透视》(1988), Long Xi Zhang《语言与阐释:东西方比较诗学研究》(1989), S. Owen的专著《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1989)等。这些论著以眼界恢宏为特征。例如,黄维梁将《六一诗话》、《怀麓堂诗话》、《随园诗话》、《渔洋诗话》、《四溟诗话》、《邹水轩词荃》、《饮冰室诗话》当成中国印象主义批评的代表作,分析了这种批评强调第一印象等特点,并和英国兰姆、黑兹利特、佩特、王尔德等人的印象主义批评作了横向比较;Pauline Yu认为中国一开始出现诗论想象便占据了中心位置,并引述《毛诗序》、《文赋》、《文心雕龙·神思》等篇章考证“象”如何从哲学语汇转变为诗论语汇,然后结合诗歌发展史纵向考察中国诗歌里想象和诗论里对想象的看法的流变。他们的著作确是旁征博引,上穷下达。

就中国古典文论的历史发展而言,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星星点点地散布于各个朝代的代表作和重要文论家之上。若将它们综合起来,可以说已初步勾勒出中国古典文论的线索。以下,笔者试将这些论著按其研究对象分为先秦至六朝、唐宋金元、明清三组予以阐述。

谈到先秦至六朝文论研究,首先要举出黄兆杰《早期中国文学批评》(1983)。该书注

译了从《毛诗序》到萧统《文选序》共12篇文论,归纳出它们使用高度印象主义、隐喻性的语言等共同特点,并探讨了中国古代对文学特性、文学目标与功能、文学评论的看法。关于先秦儒家文学观的论文有D. Holzman《孔子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1978), Weiming Tu《孟子思想中人的观念:中国美学探索》(1983)。前者指出孔子重视文学的实用性而非审美价值、造成文论中根深蒂固的视文学为教化工具的倾向,后者分析了孟子伦理观中关于自我修养对艺术创造至关重要的看法。此外,关于孔、孟的其他论著亦有述及其文论者,如Helena Wan《孔子的教育思想》谈到孔子的诗教观(1980), R. Dawson《孔子》论及孔子的礼乐观(1981)。研究先秦道家文学观的论文有:叶维廉《道家的美:无言独化,不言的、自我产生、自我限定、自我转化、自我完成的自然》(1980),该文认为道家倾向于前意识、前概念、前语言的无语界,这种观念对后世文论影响显著,陆机所谓“收视反听”,刘勰“寂然凝虑”,张彦远“守其神,专其一”的观点均可为证;米乐山《玄学与神秘主义》(1986),它比较了道家哲学与英国14世纪的神秘主义,主题是“无心”与“坐忘”等。

秦汉文论迄今仍是英语世界中国学的薄弱环节之一,可以举出的成果唯有A. Forke 注译《论衡》(1906), T. Pokora 注译《新论》和D. R. Knechtges 撰写《汉赋:扬雄作品研究》(1976)时连带论及其赋论等。相比之下,魏晋南北朝文论的探索要热门得多。例如,陆机《文赋》的译文单行本就有陈世骧《烛幽闇微之文学:陆机〈文赋〉研究》(1948,修订版1953),方志彤《陆机〈文赋〉》(1951)。E. R. Hughes《陆机的〈文赋〉》(1951), S. Hamill《〈文赋〉:写作的艺术》(1987),等等。其中,陈世骧将《文赋》的写作时间推定于公元500年,并讨论了“情”、“意”、“理”等术语的用法;S. Hamill介绍了陆机的生平与创

作,解释了“文”、“赋”的涵义,认为古代中国人对诗与逻辑、理性与非理性不加区分,与此相应,陆机《文赋》是哲学的诗。刘勰《文心雕龙》已有施友忠译本,题为《〈文心雕龙〉:中国文学观念与式样研究》(1959),它被西方汉学家认为是可靠的翻译。“龙学”论著已有D. A. Gibbs的博士论文《〈文心雕龙〉里的文学理论》(1970), F. Tökei的专著《公元3—6世纪的中国文体理论:刘勰的诗体论》(1971), P. Young-shing Shao的博士论文《作为文论家、批评家与修辞学家的刘勰》(1981),等等。其中, D. A. Gibbs根据M. H. Abrams《镜与灯》一书所提出的模式,将刘勰作为表现主义倾向(即注意艺术家内部世界的表现)的批评家看待,同时也注意到刘勰目标的、实用的、模仿的考虑,亦即关心在艺术家手中成型的文本(论“通变”等)、注意读者及其反应(论“风”等)、兼及文学对现实环境的反映(论“物感”等);F. Tökei认为刘勰的文学倾向是古典主义的,但非保守的,通变原则是刘勰文体的关键、文学哲学的枢纽,《文心雕龙》所勾勒的文学史轮廓是通变原则的辉煌展开,克服了曹丕、陆机文体论非历史的缺陷。此外,曹丕作为文学评论家的贡献已有博士论文谈及(J. K. Arase, 1986);挚虞《文章流别论》已有译介,见J. R. Allen与T. S. Phelan《中国文学评论研究二种》(1976)等;葛洪的文学思想亦有专著论及,见J. Sailey《抱朴子论:哲学家葛洪研究》(1978)等;研究萧统《文选序》的论文有海陶玮《〈文选〉与文体理论》(1965);钟嵘《诗品》也获得关注,相关论文有叶嘉莹与J. W. Walls《钟嵘〈诗品〉里诗歌批评的理论、标准与实践》(1978), J. T. Wixted《钟嵘〈诗品〉评论的特性》(1983)等。关于本时期文论的通论有Kang Sun Chang的论文《中国六朝的“抒情评论”》(1983)等;至于A. Jones的《中国早期文学里的模糊诗学》(1987)则上及于秦、下达于五代,是时间

跨度更大的关于中国小说史和小说评论、文学中的超自然因素以及叙述问题的通论。

如果说英语世界对先秦六朝文论的研究以文体综合性考察占主导的话,对唐宋金元文论的研究则显现出诗、文的明显分野。

有关本时期散文理论的研究是围绕唐宋古文运动展开的,其中包括其先驱元结文学实践的评述(D. C. McMullen的博士论文《元结与早期古文运动》,1968)等,而以韩、柳的文学观为重点。这方面的论著有D. Yu-Shih Chen Mei的博士论文《作为古文家的韩愈》(1967),V. E. Manley的博士论文《唐代中国保守的改革者——韩愈的生平与思想》(1986),C. Hartman的专著《韩愈与唐代对统一的追求》(1986),M. C. Monahan的博士论文《韩愈及其文学贡献》(1987),J. M. Gentzler的博士论文《柳宗元传》(1966),W. H. Nienhauser的传记《柳宗元》(1973),Jo-shui Chen《新儒学的发端:柳宗元与中国唐代的观念变化》(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87。正式出版时题为《柳宗元与中国唐代的观念变化》,1992),等等。有关宋代散文理论的著译相对而言少得多,笔者所见的有P. K. Bol的博士论文《11世纪中国的文与道》(1982)等。

相比之下,关于本时期诗歌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比散文理论更令人瞩目的成果。

唐代诗论方面,R. W. Bodman的博士论文《中国中古早期的诗学与作诗法:空海〈文镜秘府论〉译析》(1978)除分析该书的天卷、西卷、南卷并介绍遍照金刚其人外,还探讨了王昌龄的生平、创作与《诗格》中的诗论,分析了诗歌从齐梁体到律诗的发展;Young-Sheng Teng的博士论文《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杜牧:樊川别墅集萃》(1987)考察了杜牧的文学主张、作家评论及时代背景;M. B. Fish的论文《杜牧、李商隐之序李贺诗》(1978)指出了作序者的良苦用心,即让这位有争议的诗人本质上为保守的、传统心向的同时

代人所接受;W. H. Nienhauser的传记《皮日休》(1979)认为皮日休对其他唐代诗人的描述性评论显示了实用主义倾向;Yoon-wah Wong以《司空图其人与其诗论》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1972),其后出版了传记《唐代诗人兼批评家司空图》(1976),发表了论文《〈诗品〉里风格的理论基础》(1988);Pauling Yu撰写了论文《司空图〈诗品〉:诗歌形式的诗谜》(1978),主张将《诗品》当作整体来考察,认为司空图将诗人看成是凭直觉捕捉到自然现象的本质、辨认出赋予它们活力的道,其诗论的主旨是道家关于人和宇宙的基本观念。

宋代诗论方面的著译有Shung-in Chang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题的博士论文(1984),Yu-Shih Chen的论文《欧阳修的文学理论与实践》(1978);C. Murck的论文《苏轼之读〈中庸〉》(1983),Long Xu《苏轼创作论与批评论述要》(1986);D. Palumbo-Liu的博士论文《袭用的诗学》(1988。正式出版于1993),A. A. Rickett论文《方法与直觉:黄庭坚的诗论》(1978);J. D. Schmidt的论文《杨万里的活法》(1978);Shuen-fu Lin的论文《姜夔论诗歌与书法》(1983),刘若愚的论文《姜夔论诗》(1985);张彭春的译本《沧浪诗话》(1929),等等。属于综论性的有W. C. Fisk的博士论文《中国中古文论与西方现代文论里的形式主题:模仿、指涉、用喻与置前景》(1976),魏世德的论文《宋代和西方的论诗诗》(1985),Hsiao-ching Hsu《作为宋代文学评论形式的诗话》(1991)等。以上论著中,W. C. Fisk的博士论文是别具一格的。照作者的解释,模仿指的是情的内涵以相关的景的内涵为手段的暂时性显现,其结果为情在景中;指涉则是一种文本在另一种文本里,其方式为用事、蹈袭、点铁成金等。模仿、指涉可看成分别借助自然景物与他人作品而形成想象的两种途径,比喻、置前景则是表达过程中的两种途径。比喻是抽象呈

现于具体之中,置前景则使文本中一切要素均辐辏于它的某一部分(“诗眼”)。作者从宋代诗论里拈出这四个相关命题之后,将视野扩展现代西方文论的对应物并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以研究黄庭坚诗论为主旨的博士论文《袭用的诗学》也很有特色。作者D. Palumbo-Liu将黄庭坚“以故为新”、“脱胎换骨”之类主张和西方文学传统联系起来,介绍了朗吉弩斯等人关于模仿、技巧、创作的自发性看法,指出它们都关系到人工与自然的矛盾,不过,如果说西方罗马传统里诗人人力求擦去先前作家的标记以求为自己腾出空间的话,在中国传统里诗人则追求使过去文本的片断适应于自己的要求、实现今昔文本相嬗以维持文化话语意义的延续性。

关于金元诗论的博士论文有J.T. Wixted《元好问的文学批评》(1976)和邓昭祺《元好问〈论诗绝句〉研究》(1984)等。其中,J.T. Wixted之作已以《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论》为题正式出版(1982)。作者认为元好问的独创之处在于调和了整个诗歌传统,撷取先前的吉光片羽编织成密而巧妙的诗行,和西方的蒲柏颇为相似,后者的《批评论》(1711)尽管在观念上并不新颖但却写得优雅。

诗文论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宋末罗烨所编的保存了小说理论资料的《醉翁谈录》已由G. Foccardi译成英语(1981);元末陶宗仪所撰的保存了曲论的《辍耕录》亦有F. Mote的专论(博士论文,1954)。不过,总的来说,小说理论、戏曲理论是到明清才趋于繁荣的,英语世界的学者们相应将注意力投向该时期,对于此前的理论酝酿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英语世界对明清文论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诗歌理论继续占优势,但因对词论的开掘而显得更为丰富;散文理论研究拓展到骈文、八股文;小说理论、戏曲理论提到了议事日程。

明清传统诗歌理论研究的代表作有R.J. Lynn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明清对元诗的看法》(1978)、《明代诗论里通往自我实现的不同途径》(1983),黄兆杰的论文《王夫之论著里的“情”与“景”》(1978)和其所译《姜斋诗话》(1987),以及博士论文《重建明代前后七子的批评理论》(颜婉云,1981)、《清代诗论的发展》Wei-Ping Liu, 1967)、《王夫之哲学思想里的自然、人工与表现》(A.H. Black, 1979。正式出版时题为《王夫之哲学思想里的人与自然》,1989。涉及诗论)、《传统与综合:作为诗人和评论家的王士禛》(R.J. Lynn, 1971)、《黄节〈诗学〉》(E. Huff, 1947)等。词论研究并不限于明清时期(例如,Pin-ching Hu写的文学传记《李清照》便述及其《论词》,认为这位女词人作为批评家很少有谦卑,对其同时代人相当严肃。1966),但却以本时期为重点。贺裳《邹水轩词筌》被黄维梁举为中国印象主义批评的代表作,已如前述;常州派词论有叶嘉莹的评析(1978);王国维《人间词话》已由涂经治英译(1970)。从整体上对王国维加以考察的还有涂经治的博士论文《王国维的文学评论》(1969),J. Bonner的博士论文《王国维对整合的追求》(1980)等。

关于明清散文理论的著译有D.S. Nivision的专著《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1966),T.S. Phelan对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的译介(见《中国文学评论二种》,1976)等。在谈到章学诚的文学观时,D.S. Nivision指出:处于读书首先为应考的时代,章学诚作为教师不能不教八股文写作,但他清楚地认识到八股文的局限,因而主张让学生由习作古文入手;章学诚肯定归有光反对假古董、提倡古文,但又批评归氏浮浅而流于纯粹风格上的模仿;章学诚歆羡百家争鸣时代诸子的文章,并在气质上接近他们(尤近韩非子)。此外,Man-Kam Leung的博士论文《阮元:一个中国学者兼官员的生平、著作与经历》

(1977) 设专章论述了阮元锺爱骈文的文学极端主义及清代的骈散之争; Karl-heinz Pohl《诗人、画家、书法家郑板桥》(1990) 将郑氏的文学观区分为诗、文两方面, 诗论方面集中分析了他重经世济民、反蹈袭故常等主张, 散文理论方面探讨了他为八股文所作的辩护。

戏曲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Kai-cheong Leung 的博士论文《作为戏曲评论家的徐渭:〈南词叙录〉注释》(1974), B.G. Doar 的博士论文《中国戏剧评论的发展(1898—1918)》(1983), 以及 N.K. Mao 与柳存仁合写的传记《李渔》中关于其戏剧评论的分析等, 数量不是很多。相比之下, 还是小说理论较受重视, 计有相关论著《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精神》(J.R. Levenson 1967)、《梁启超与中国的观念变迁》(Hao Chang 1971)、《新小说》(Keiko Kockum, 1990), 传记《金圣叹》(J. Ching-yu Wang, 1972), 博士论文《晚清小说理论》(Gek-nai Cheng, 1982), 论文《〈红楼梦〉与脂评》(J.C.Y. Wang, 1978)、《作为新小说提倡者的严复与梁启超》(夏志清, 1978), 译本《中国小说读法》(D.L. Rolstoh, 1990) 等。其中, 读法汇译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张竹坡《〈金瓶梅〉读法》、刘一明《西游原旨读法》、张新之《〈红楼梦〉读法》以及《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的章回评点和闲斋老人序。

英语世界关于明清文论的研究实际上是有分有合的, 其分见诸上述的文体专论, 其合见诸对文学思潮的考察。后一类论著包括论文《意象的富丽堂皇: 重新认识公安派的文论》(J. Chaves, 1983), 博士论文《作为批评家的李贽: 明代观念史之一章》(Eng-Chew Cheang, 1973), 《袁宏道与明代后期的文学运动与思想运动》(洪铭水, 1974),

《现实与想象: 李贽与汤显祖对“真”的追求》(Pei-Kai Cheng, 1980), 《袁宏道及晚明文学中自我表现的倾向》(Chih-ping Chou, 1982)。以及据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袁宏道与公安派》(Chih-Ping Chou, 1988), 这部专著主要分析16世纪早期至17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 强调明代复古派和公安派之间在文学表现性灵方面的一致之处。

与中国本土的古典文论研究相比较, 英语世界的相关论著呈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 常以西方文论的新成果为参照系, 象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和 D.A. Gibbs 《〈文心雕龙〉里的文学理论》就都借鉴了 M.H. Abrams 在《镜与灯》一书中提出的理论框架; 其二, 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 如周英雄《作为结合的模型的“兴”之语言的神话的结构》与 J.J. Deppney《诗学: 中国风格》便是如此, 这两篇论文分别收入《中西比较文学理论与策略》(1980) 和《比较文论新探》(1989); 其三, 用西方“表现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之类术语标定中国古代文论家, 如 Eng-chew Cheang《作为批评家的李贽: 明代观念史之一章》着力剖析李贽作为“反传统主义者”的特征, W.H. Nienhauser《皮日休》将其文论归结为“实用主义”等。平心而论, 上述“标定”的做法有时因忽视中国古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显得不够妥当, 某些译作和论著中的译法和提法也大可商榷。但是, 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从总体上看是硕果累累的。它们既为中国本土的学者们提供了本民族古典文论跨文化传播的实例, 有助于认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又可开启审视中国古典文论的新思路、扩大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治学视野, 同时还具备鲜明的情感激励功能——其他文化圈内的学者们正以日益巨大的规模展开对中国古典文论的探索, 我们自己又怎么能裹足不前呢?